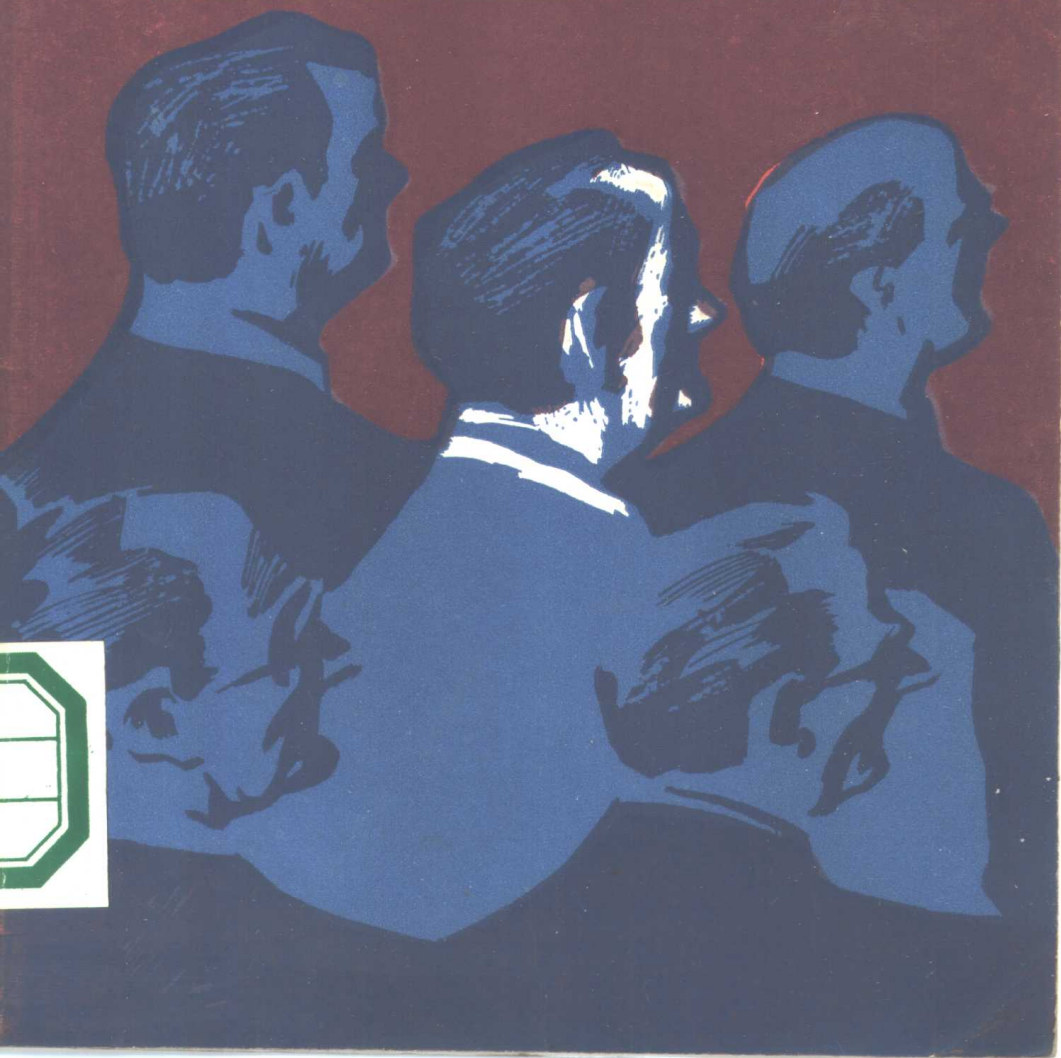


# 保 护 网 下

海因里希·伯尔



# 保 护 网 下

网络时代下的网络保护



# 保 护 网 下

〔联邦德国〕海因里希·伯尔 著

德诚恩 赵登荣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 北京

HEINRICH Böll  
FÜRSORGLICHE BEIAGERUNG

---

本书根据科隆 KIEPENHEUER & WITSCH  
VORIAG 1979年版译出

封面设计：秦 龙

保护网下  
BAOHUWANG XIA

---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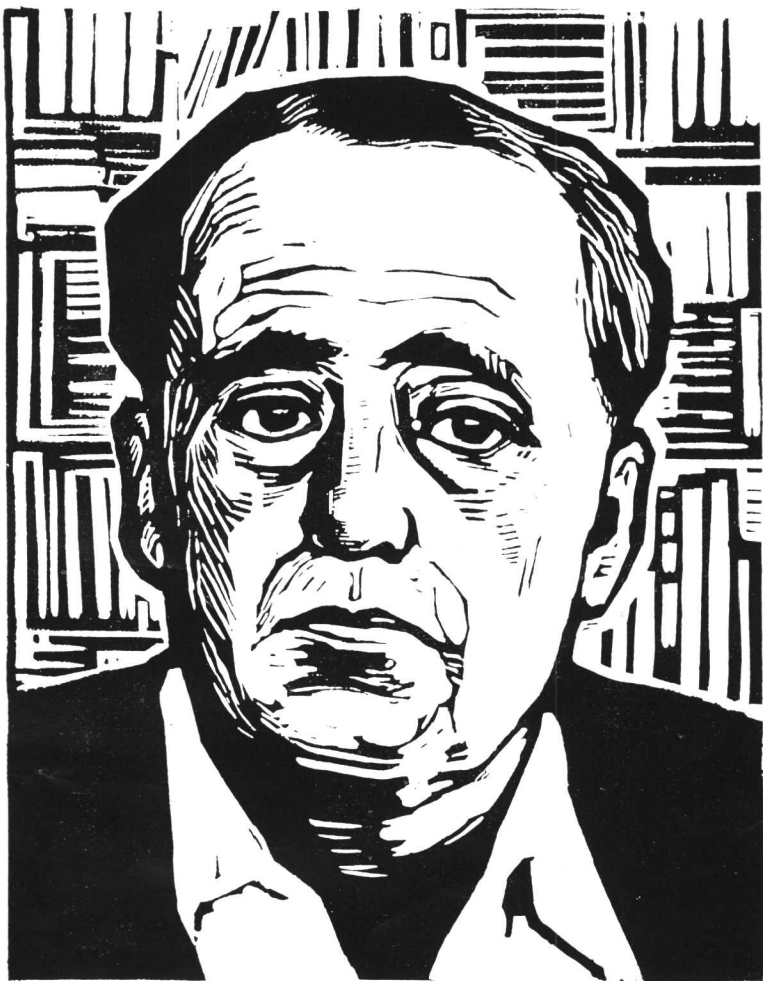
字数 232,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2\frac{1}{4}$  插页 3

1987年5月北京第1版 198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4,200

---

书号 10208·252

定价 2.00 元



海因里希·伯尔像

伍必端木刻

## 译 本 序

自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已有四名德语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是其中真正作为公民生活在联邦德国国土上的却只有海因里希·伯尔一人。伯尔在获得这一荣誉之后，却成了联邦德国最有争议的作家。有的评论家把他贬为“文才平平却又大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他的每部新作问世都会引起激烈的争论，尤其是《保护网下》于一九七九年八月出版后，联邦德国的评论界对它毁誉不一，而且批评意见占了上风。有影响的评论家如赖希-拉尼茨基说，这本小说语言贫乏，读来让人“受罪”；另一位赫尔曼·布格尔则断言，这是“一位晚年文风日拙劣却又摆脱不了早年情节”的作家的作品；还有人干脆宣布《保护网下》是伯尔文学艺术生涯的送葬曲。

有趣的是，这本书一发表就在国外获得很高的评价，各种文字的译本也相继出版。法国《快报》评论说，“它用雅俗共赏的语言描述了引人注目的人物”，“写作技巧十分高明”；美国《纽约时报》把它的英译本列为一九八二年最值得一读的二百本书之一，并在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发表文章说，这部小说突破了伯尔早年作品中好人与坏人鲜明对置的格局，这是美学技巧上的一大进步。

五年之后，就连联邦德国评论界内肯定此书的声音也响亮而坚定起来了。前联邦德国作协副主席、小说家约尔根·洛德曼说：“与《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相比较，《保护网下》的内容更加丰富，在写作技巧上也不象前一部那样有不少广告色彩……，而是运用复杂的、环环相扣的手法处理情节的发展。”<sup>①</sup>具体派诗歌的主要代表、著名诗人海森比特尔在一九八五年出版的《海盗》杂志第25期上更是斩钉截铁地批评了联邦德国评论界对于《保护网下》的偏见和机会主义态度，明确地肯定了这本书的美学成就。

对于一部小说的评价，何以会有这么大的起伏呢？《保护网下》的故事是围绕着如何对待恐怖分子活动以及如何对待国家所采取的相应的保护措施这一问题而展开的。对于西方社会来说，这个问题实在太敏感了。伯尔本人对此又持何态度呢？那就让我们来看一看社会历史背景吧！这对于了解伯尔的创作动机，了解这部小说之所以引起争论的原因，都是有益的。这个背景，我们可以追溯到十多年之前。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清晨，联邦德国凯斯劳滕市的一所银行遭抢劫，一名守卫银行的警察被抢劫者枪杀。发行量极大的《图片报》马上捕风捉影地发表耸人听闻的报道，说这次杀人抢劫事件是巴德尔—迈因霍夫恐怖分子集团的新暴行。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抢劫事件后三周，伯

---

<sup>①</sup> 约·洛德曼：《今日德国文学》，中译文载《外国文学》（1985年11月号）。

尔在《明镜》周刊发表题为《乌尔里克要的是赦免还是安全通行证》一文批评《图片报》的行为。他认为，第一，联邦德国是一个有六千万人口的国家，而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是一个只有六个人的反对社会政治体制的组织。如果夸大这个集团的罪行，说国家由于这个集团而处于危险境地，那么当局就可以利用这种情绪宣布处于非常状态，这样一来，人民的基本权利就会受到侵犯，因为从纳粹党上台前后的历史教训看，在非常状态下，警察和司法部门大有可能把政治案件和刑事案件混为一谈；第二，《图片报》用谎言和挑拨等无耻手段蛊惑人心，煽动反恐怖分子的歇斯底里情绪，伯尔认为，这是一种鼓吹动用私刑的法西斯行为，在法制国家里不能容忍报刊利用没有根据的直觉来煽动公众，把公众卷进法律判决中去。伯尔指出，对于恐怖分子也应在其人身安全受到保护的条件下公开起诉和审判，同时也应对《图片报》起诉。

伯尔这篇文章发表后，右派报刊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发表了几百篇文章和许多漫画攻击伯尔，说他美化恐怖活动，包庇恐怖分子。他们甚至说，沿着恐怖分子暴力行动的“血迹”追根溯源就能找到伯尔；与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相比，伯尔之流是更为危险的人物，因为恐怖分子的胡闹总有一天会烟消云散，但伯尔之流会长期存在下去，他们是民主制的更大威胁；批评警察的人就是和恐怖分子穿连裆裤，就应把他们当作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对待等等。



一九七四年，有一个名叫马蒂亚斯·瓦尔登的记者就西柏林高等法院院长冯·德赖克曼被杀事件发表电视评论。他说，“暴力的土壤由于有人野蛮地同情恐怖罪行而肥沃起来”。他在说这一番话时列举了伯尔等人的名字。伯尔的回答是向法院起诉，控告瓦尔登的污蔑罪。虽然诉讼持续了六年之久而且以伯尔胜诉告终，但伯尔当时就根据以上种种经历，于一九七四年发表了中篇小说《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暴行是如何发生的，并能导向何方》。这是一本受到读者热烈欢迎的小说，在我国也已经有了译本。伯尔在这篇小说里揭露了新闻报刊的垄断组织为了赚钱不惜践踏别人的尊严，制造轰动一时的假新闻。于是，一个人若不顺应时势，就可能被污蔑为恐怖分子，名誉被毁，人身受到威胁，而许多暴力活动便是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产生的。

一九七七年，联邦德国又发生了震惊社会的三大恐怖案件：杀害联邦总检察长布巴克，杀害德累斯顿银行行长庞托，劫持雇主协会主席施莱尔。施莱尔案件最为引人注目，他被劫持后当局千方百计营救，但最终被恐怖分子杀害。联邦德国政府为他举行国葬，由当时的总统谢尔致悼词。三大案件之后，联邦德国全社会人心惶惶，权势集团与商人更加胆战心惊，各种保镖公司生意兴隆，门庭若市。当局扩建了联邦刑事局，使它成为欧洲最现代化的缉捕中心；惩治恐怖分子的刑法也越来越严，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控制住恐怖活动，它反而越演越烈，组织也变得更加严密。三

大案件之后一年有余，联邦德国日常生活中的经常性话题——随身保镖、安全等级、保护和监护等等——又进入了伯尔的另一部小说，也就是《保护网下》。

《保护网下》以很高的灵敏度反映了联邦德国七十年代的现状，它几乎赶上了新闻报道的速度。这本小说正面抨击当时的时代问题，而且把各种问题联系起来归到一张网下：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开采褐煤蚕蚀土地、片面追求工业增长速度、能源问题、知识青年脱离父母而过着不符合社会常规的生活，色情浪潮，恐怖活动，警察监视与保护等等。日后有人说，《保护网下》这部小说成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联邦德国社会状况的百科全书。

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到，这个社会的表层是那么安静、富足，表层下面却潜伏着深刻的危机。伯尔写道，雇主协会会长之子罗尔夫·托尔姆住的村子里，“处处都收拾得井井有条，象小公墓里的一排排坟墓，一种坟墓里的寂静。就在这寂静之中，农民施默尔根的儿子突然在牛厩里上吊自杀，没有明显的原因……”，“农民哈尔斯特又突然杀死了妻子。哈尔斯特是个彪形大汉，拥有一座规模宏大、经营有方、组织完善的农庄，农庄四周有一道很长的围墙，墙上有一座圣母像，总是供着鲜花、点着长明灯。”

这些“突然”的自杀与他杀都没有任何明显的个人原因，他们仅仅感到生活没有意义，感到绝望，要求解脱。即使是恐怖分子，伯尔写道，以往“他们生活不坏，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他们也从这个社会得到过好处。这个社会不知从哪

个遥远的地方得来高额利润，使得他们也能分享一点残羹剩饭。”可是他们难以容忍的是个人权利不断被剥夺，人格商品化，生活被金钱所支配。小说里的海因里希·勃韦洛由银行家变成为恐怖分子的转折点，就在“他发现了‘金钱’这个‘国际大陆’的时候”，“是啊，也许借助对尼伯龙根的思考比借助任何嫉妒或仇恨哲学或者诸如宿怨之类愚蠢的说法更能接近海因里希的动机：金钱的数目大到无法计算，却还在利上生利，谁也花不掉，对谁也没有用处，金钱只是自行激增，自我满足，象不知羞耻的近亲繁殖那样地激增，这是一条有许多脑袋的水怪，于是他设法砍掉所有这些脑袋……。”

如果把《保护网下》、《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和伯尔的早期作品作一番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伯尔观察现实的目光愈来愈尖锐，对于现实的批评也愈来愈严厉。这就是《保护网下》受到联邦德国评论界猛烈抨击的原因。这些批评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保护网下》是伯尔耄耋之年美学上虚弱之作。表面看来，这是美学的批评，实际上是不同意文学作品认真地去接触社会中的棘手问题。持相反意见的评论者约阿希姆·凯泽当时就指出：“摇头叹息的读者将难以理解，为什么伯尔这本书会引起如此多的仇恨与敌意，这绝不是由于伯尔在残暴的野心家和无政府主义分子二者身上都找到了‘可爱之处’……也不是由于伯尔已经把他的玄奥的咒语——德语完全荒疏，忘得精光。其原因恰恰在于伯尔的这部小说击中了要害……”<sup>①</sup>正因为

<sup>①</sup> 载《南德意志报》(1979年8月25—26日)。

如此，海森比特尔针对那些批评家旗帜鲜明地说：“我要在这里毫不含糊地指出，伯尔的美学能力是同他对于联邦德国现实认识的敏锐性同步增长的。”

《保护网下》的美学成就究竟表现在哪里呢？这部作品是选用虚构小说作为媒介的；然而，伯尔把这种媒介的界限扩大到了最大限度，把虚构的人物、情节、主题和六十年代流行的文献纪实小说的各种要素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新颖独特的效果。伯尔在小说开始之前有一段声明：“本书人物、场面、情节、问题、冲突均系作者虚构。如与所谓的现实有巧合与近似之处，本书作者一如既往概不负责。”这就是说，这本小说的前提是虚构，不是新闻采访，不是真人真事，它的细节是不真实的，甚至是极端夸张的。然而本书的虚构又同真人真事有“近似”之处。“近似”当然是作者自觉的艺术处理的结果，所谓“巧合”不过是作者的一种幽默。《保护网下》的笔调是冷静客观的；即使在极度的夸张处，也只有剖析和思考，并没有渲染和造作。这些都是文献纪实文学的特点。就这种意义而论，《保护网下》既是小说，又是时代的报告，是一篇可以让人了解当今西方社会的报告。

伯尔的作品是同联邦德国各个时期的现实紧密相关的。但又不仅如此。伯尔自己说过，他总是以他的作品来探讨某些“神话——神学”的“难题”。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纵观伯尔卷帙浩繁的作品，它们反映的历史现实虽然极不相同，但是他们的主题总是围绕某些“神话——神学难题”的。他的长篇小说也好，短篇小说也好，乃至诗歌、广播

剧，都没有偏离他所偏爱的主题，众多的各种体裁的作品不过是这些主题的重复、变化和加工。以《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为例来说，它当然具有论战性质，有政治现实性，然而它的主题（大众媒介和传播工具污蔑人）却是一个古老的主题——一个人的尊严受到流言蜚语的损害而无法自卫。这样一个主题不仅在古代神话里就有，而且本身就具有神话的性质。

《保护网下》所表现的神话性主题乃是过分的、无微不至的爱会损害被爱者的人性。这个主题也是古已有之。《保护网下》这个书名按照原文直译应是“出于关怀而围困”，“围困”、“包围”是军事概念，它唤起对战争、暴力、争斗等等的联想。“关怀”呢？那就是替别人操心，想为别人分忧，是主动地去爱护他人的愿望。可是，为了“关怀”他人却把人家“包围”了起来，这岂不是矛盾的吗？岂不是荒谬背理的吗？

一个人受到恐怖分子的威胁，警方对他采取安全保护措施，这可以说是一种“关怀”。伯尔并不一概地反对这种安全保护措施，且认为这是维护社会正常生活所必需的。但由于恐怖分子无孔不入，警方便把安全保护措施也搞得天衣无缝，这样一来，人们不是被保护就是受监视，或者同一个人既是保护对象又是监视对象。人们都被这种保护措施“包围”住了。如小说主人公弗里茨·托尔姆的女儿扎比内说，“既有人警卫，又被人监视，这你大概是知道的。你也知道，我就象在监狱里。”弗里茨·托尔姆自己也说：“我们最

好心甘情愿当个囚徒，心甘情愿等着，或者虽有严密保护依旧被人杀死，或者被过分紧张的保卫人员杀死。”

“出于关怀而围困”，结果是使人成为囚徒，囚徒们被迫不再关心自己。囚室之外的世界成了永远不属于他们的外部世界，他们也无法理解这个外部世界。雇主协会会长弗里茨·托尔姆说，“你还记得那件荒谬得十分可笑的事吗？我想骑一次自行车玩玩，这是我旧时的乐趣。结果是两辆警车开道，一辆警车殿后，上面还有一架直升飞机保护——如此可笑，我真受不了。”他们已经退出了正常人生活的世界。一旦回到正常世界里，他们就变成是只会对外界作出机械反应的人。只要能预见到警察对他们会有什么要求，他们就千方百计去迎合。

这位小说里的报业巨头弗里茨·托尔姆不仅有保卫人员替他操心，而且有他的下级、他的朋友替他操心。他手下的工作人员阿姆普兰格尔父子常说，“这些事儿您尽管放心让我们管吧！”弄到最后，托尔姆自叹道：“我是一大批报纸的所谓主人和主宰，可是我已经无法统观这些报纸的全貌，我怕我那个八十平方米的大办公室，它形同虚设，我就坐在里面签字、喝茶。”

不仅人的行动与工作的自由被剥夺了，甚至连爱的自由也丧失了。《保护网下》描写了好几对夫妇或情人的爱情生活。由于他们都受着保护或监视或既受监视又受保护，所以，他们的爱也被“出于关怀而围困”着，而这种“围困”本身却变成了一种“爱”，这种所谓的“爱”剥夺了被保护与监视

者的真正的爱，他们的人性受到了摧残。人性的健全发展是德国古典主义文学所追求的理想，歌德、席勒等古典主义者的不少作品就是以此为主题的。而伯尔就这样把这一古老的主题同当代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使得小说含义深刻又富有新意。正因为如此，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可以成为过眼烟云而被人忘怀，但这本小说却不会时过境迁而失去艺术魅力。这可以说是《保护网下》的又一美学特点。

《保护网下》是伯尔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一九八五年七月十六日，这位大作家与世长辞了。八月十九日，出版了他的最后一部遗作《河边风光前的女士们》。这部小说讲的是波恩政治家的内幕故事，波恩成了罪恶的渊藪，政治家都是些无恶不作的蒙昧主义者。《河边风光前的女士们》不是影射小说，小说中的人物不等于当今真实的波恩政治家。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伯尔对现实社会又作了一次猛烈的抨击。

伯尔去世后，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致电伯尔夫人说：“随着海因里希·伯尔的去世，我们失掉了一位德国文坛巨擘。无论思想自由在哪儿受到威胁，他总是奋起维护它。他好争吵令人不快，他既叫人反感，又赢得别人尊敬。”这个电文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政界人士对于伯尔的看法。当年七月下旬，“伯尔热”一时席卷联邦德国，各大书店的伯尔小说销售一空，电视台天天重播由伯尔小说改编的电视故事片。由此可见，西德广大读者何等热爱伯尔。

伯尔作品已经译成四十五种语言，世界各种文本的总

发行量已达三千一百万册。尽管他的作品所反映的现实已经成了几年之前乃至近半个世纪之前的历史，然而这些作品依旧深受喜爱经久不衰。

伯尔也是中国读者熟悉和喜爱的当代外国作家之一。他的重要著作如《小丑之见》、《莱妮和他们》、《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等已陆续在我国译出，赢得了广大的读者。为了纪念这位已故作家，谨以本书奉献给我国读者。

倪诚恩 赵登荣

一九八六年三月



献给我的儿子赖蒙德、勒内和樊尚——  
以表谢忱。